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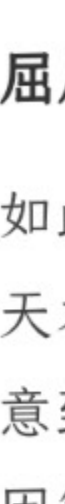


035 司马光为什么把屈原删得一千二净？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 (年度日更)

进入课程>

07-27

035 司马光为什么把屈原…

10:28 9.59 MB

↓

转述师：金北平

你好，欢迎来到《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》。

上一讲谈到，胡适提出著名的“箭垛说”，对屈原的身世和著作权的可靠性提出了严重质疑。这些质疑自有时代的特殊性，而《资治通鉴》对屈原如此一位重量级的历史人物竟然只字未提，难道司马光对屈原也有质疑吗？

屈原的本职

如此古怪的一件事，当然不至于等到今天才轮到我们来吃惊，古代读书人早就注意到了。清朝初年有一位不肯做官的李因笃，才学很高，名满天下，天下一流学者争相跟他结交。

李因笃熟读《资治通鉴》，有一次和顾炎武聊到自己的读书所得，说《资治通鉴》并不记载文人事迹，以屈原的为人，被司马迁奉为“与日月争光”，但《资治通鉴》对他只字不提，还有杜甫，仅仅因为王叔文在某个特定场合吟诵了他那句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的名句，杜甫的名字才在《资治通鉴》里边有幸被提了一笔。

前边讲过，司马光编撰《资治通鉴》有自己很明确的取舍标准。在“舍”的方面，文学首当其冲。所以在《资治通鉴》里，和文学——甚至还可以把概念再放宽一点，文化——有关的内容很少。所以李因笃的发现并没有错，他只是不理解司马光为什么要这样做。

顾炎武说：我能理解。这部书意在“资治”，文人墨客哪有什么“资治”的价值呢？

顾炎武还引述了一则典故，说唐文宗亲自把翰林学士丁居晦提拔为御史中丞，在正式发布任命诏书的当天，唐文宗对总理大臣说：“朕曾经问过丁居晦，说有流行语把杜甫、李白几个人合称‘四绝’是怎么回事，丁居晦回答说：‘这不是皇帝应该操心的事情。’因为这句话，朕记住了丁居晦这个人，相信以他的见识配得上御史中丞这个职位。”

顾炎武最后点题式地奚落了一下李因笃：“你看，你的见识照唐文宗可差了一截。”（《日知录》卷26·通鉴不载文人）

顾炎武和李因笃的这段对话，出自顾炎武的学术笔记《日知录》。《日知录》这个书名，出自《论语》当中孔子高徒子夏的一句话：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所谓“日知其所亡”，很有今天“得到”的学习精神，每天都能学到一点新知，日积月累下来也就不得了了。

顾炎武的“日知其所亡”看来比李因笃来得功力深厚，但两个人其实都跑偏了，偏就偏在都把屈原当成文人了。

先秦时代并不存在“文人”这个概念，屈原虽然能写诗，还能写出超一流的文学水平，但他并不因此就成为一名文人。他是政治核心圈里的贵族，搞变法，搞外交，这才是本职，写《离骚》只是因为生闷气需要排解，写《九歌》很可能是为了服务于楚国特有的祭祀典礼。

屈原就算抛开一切文学成就不谈，也该算是楚国政坛上一个值得大书特书，或者至少值得花费三言两语交代一下的人物，总不能因为他会写诗就抹煞他在历史上的痕迹，抹煞他的人生对于“资治”所特有的意义吧？

《通鉴》掩日月之光

古代中国第一流的学术笔记，除了明清之际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以外，还有宋元之际王应麟的《困学纪闻》。王应麟对于《资治通鉴》不提屈原也有自己的看法，但没写在《困学纪闻》里，而是写在《通鉴答问》里。

《通鉴答问》，顾名思义，全书用问答体，围绕《资治通鉴》有问有答。

关于屈原的提问是这样的：孔子著《春秋》，搞的是编年史，司马光写《资治通鉴》，搞的也是编年史，按说复兴了孔子的传统，但是，人家孔子的《春秋》惩恶扬善，连一丁点的善都要表彰出来，怎么到了《资治通鉴》这里，反而把屈原这种伟大的榜样都删掉了呢？

我们有必要读两句原文：“《春秋》褒秋毫之善，《通鉴》掩日月之光。”如此一经对比，感觉司马光非蠢即坏，反而是儒学造诣并不太好的司马迁称赞屈原，简直夸出花来了，修辞之美一点都不亚于《离骚》，最后说屈原的心志“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。“与日月争光”这个短语就是这么来的。

所以《通鉴答问》的质疑显得特别在理，它意味着：书写历史，以史为鉴，“资治”的意图当然没错，但最有“资治”价值的就不就是惩恶扬善吗？要做到惩恶扬善，当然要树立好榜样和坏典型。

对好榜样要使劲夸，夸上天去，对坏典型要用力贬，贬下十八层地狱。而要问历史上的好榜样，能有几个人比得上屈原呢？写一部意在“资治”的编年史却删掉屈原，这不就等于拍一部印度电影却删掉大象和歌舞的戏份吗？

王应麟的回答是：《春秋》惩恶扬善的精神，《资治通鉴》虽然学了，但好像没学到位，所以朱熹才改编出来一部《通鉴纲目》嘛。屈原的伟大人格虽然被《资治通鉴》埋没了，但终于还是被《通鉴纲目》发扬光大出来。（《通鉴答问》卷2）

确实，朱熹看不过《资治通鉴》不载屈原，所以在《通鉴纲目》里边专门补充了相关内容。但司马光到底为什么要删掉屈原的戏份，朱熹并不清楚，王应麟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。

司马光的动机

难道就没有人探究过司马光的用心吗？当然有。

深究一下的话，《通鉴答问》所谓“《春秋》褒秋毫之善，《通鉴》掩日月之光”不是原创，而是从刘义仲的《通鉴问疑》当中抄录来的。其人其书，前边已经提到过一次。（S1-188）

这位刘义仲，身份有点特殊，是刘恕的儿子。

当初司马光主持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招揽史学人才，有3位最得力的助手：一是刘攽，汉史专家，负责起草《资治通鉴》两汉史的内容；二是刘恕，相当于《资治通鉴》的副主编，同时承担着《资治通鉴》魏晋南北朝和隋朝的内容起草工作；三是范祖禹，唐史专家，负责《资治通鉴》唐五代史部分，后来因为和司马光的史学观念不合，单飞写成了一部《唐鉴》。

刘义仲作为刘恕之子，勉强算得上《资治通鉴》成书的半个亲历人，他写出来的这部《通鉴问疑》记载了父亲刘恕和司马光关于编修《资治通鉴》的各种讨论，是“通鉴学”研究的一手资料。刘义仲说，父亲刘恕做的是史料性质的工作，专注的是史实怎么考订，怎么编年，至于取舍标准，道德评判，全部交给司马光处理。

刘义仲还在书里谈到，自己无缘得见司马光，搞不太清司马光的史料取舍标准，所以阅读《资治通鉴》的时候生出疑问，该向谁去讨教呢？父亲已经不在，司马光也不在了，编写《资治通鉴》的书局元老硕果仅存，就只剩下范祖禹了，那就把问题整理出来问问范老伯好了。

问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一个就是屈原问题：为什么以《资治通鉴》的包罗万象，偏偏把屈原的事迹删得一千二净呢？

问题发出之后，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：范祖禹认真地给出了回答，先夸刘义仲擅于提问，提的都是好问题，然后说这些问题都是自己曾经和司马光探讨过的，所以自己给出的解答，应该可以使刘义仲和其他同样怀有好奇心的知识分子满意。

坏消息是：范祖禹以上这些话，刘义仲抄录在自己的《通鉴问疑》里边，而范祖禹具体给出的回答，刘义仲没抄，范祖禹本人也没存底稿。所以我们仅仅知道的是：第一，司马光对屈原的删节确实有认真的考虑，并非疏漏；第二，司马光并不否认屈原的“日月之光”，因为司马光专门为屈原写过一首诗，字里行间各种赞美，最后说的是“空余楚辞在，犹与日争光”，和司马迁的评价并无二致。

当代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有各种推论，看上去最合理的一种意见是说屈原的才干和职场经历太像王安石，所以司马光不愿意《资治通鉴》的读者产生这种联想。（赵逵夫《屈原与他的时代》前言）但问题是，如果说这就是司马光深藏在心里的动机，肯定也就不会拿出来跟范祖禹讨论了。反正无论如何，各种推论就算再如何言之成理，也只能是死无对证了。

《资治通鉴》不载屈原的问题就谈到这里了，下一讲让我们回到《资治通鉴》的文本，看一看无论屈原也好，陈轸也好，谁都没能遏止住楚怀王对张仪的偏听偏信，楚怀王会怎么跟齐国断交，又会怎么跟张仪扯皮呢？

我们下一讲再见。

划重点

添加到笔记

- 1.《资治通鉴》对屈原只字未提，引发了后世学者的接连讨论和推测。
- 2.顾炎武认为《资治通鉴》意在“资治”，所以不提文人屈原。这其实忽略了屈原是楚国政治核心圈里的贵族。王应麟认为不提屈原，是《资治通鉴》学《春秋》惩恶扬善的精神没学到位。
- 3.《通鉴问疑》显示司马光并不否认屈原的伟大，当代学者推测可能因为屈原太像王安石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我们为此门课配套了一个知识城邦学习话题，欢迎你记录学习收获，和其他同学互动交流，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学习。课程老师@熊逸、主编@李倩也不会定期出现在讨论区哟~

戳此参与讨论>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

来，带你跑个中国历史马拉松

版权归得到App所有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

< 前一篇

后一篇 >

赞赏

如此好文章，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！

微信

朋友圈

用户留言

默认 最新 只看作者回复

乐趣

7月27日

+ 关注

王应麟在《通鉴答问》提出了《资治通鉴》不写屈原的疑问，认为是司马光学习《春秋》学的不够到位。这显然没有太大说服力。朱熹看不惯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不提屈原，在《通鉴纲目》中补充了屈原的相关内容，但也没有给出司马光不写屈原的答案。

最靠谱的应该还是刘义仲从范祖禹得到回答。那回答到底是什么呢？或者说是什么答案能让范祖禹信服了呢？或平静的接受了呢？

让我们从范祖禹这个人物身上寻找答案。范祖禹进士科甲之后跟随司马光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对仕途不感兴趣。王安石也很欣赏他的才华，但范祖禹与王安石很疏远。富弼也很喜欢范祖禹，富弼甚至在临终时将密奏交给范祖禹让其代为上奏，密奏中言辞激烈的抨击了王安石新法误国。大家都觉得范祖禹代为上奏会得罪王安石，不让他这样做，可范祖禹不惜得罪王安石还是上奏了。

从以上记载的范祖禹履历可以看出，范祖禹确凿无疑的属于反对王安石的保守派阵营，与司马光有相同的政治立场，而且为人淡泊名利。所以司马光想要说服范祖禹，说难很难，说容易也很容易。

说难，因为范祖禹淡泊名利，对学术叫真儿，有正义感。说服确实很难。

说简单，司马光只要讲共同政治主张，讲国家大义，讲为天下苍生计。说服范祖禹就会很容易。

我觉得以当时的情况，司马光完全可能会和范祖禹明讲：“屈原太像王安石了，写屈原会给王安石做背书。”而后来与司马光政治主张圈子比较接近的刘义仲等人，对此答案没有留下确切记录，也很可能是有意为之。

所以，屈原太像王安石了，这也许确实就是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不写屈原的真实原因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4 3 232 分享